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精神

王彩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08BZW064)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精神

玉彩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精神/王彩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61-2193-1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儒家—传统文化—研究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B222.05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62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7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朱栋霖

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关系？过去的研究是否定的。五四新文化为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就以讨伐中国传统文化为入手，言辞激烈的反传统姿态表达了新文化倡导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立场。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数十年间，毛泽东的论断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南。在半个世纪中国激烈变动的政治环境中，源于种种政治文化原因，彻底反传统不断被诠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精神。而这种关于历史文化精神的诠释与宣扬，又引导了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走向，真正拥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创新之作鲜有问世。而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层出不穷、不断变幻的革命化、现代性吁求又将反传统的呼声推向亢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已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的不可挽回的深创与现状。

对于五四反传统思想，较早提出反思和强烈质疑的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林毓生。他在197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剖析此问题，揭示其历史的危害：“从历史角度对五四时期作一回顾，我们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特色”，“……就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史中社会和文化改革运动而言，这种反传统的、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46页。）

但林毓生的反思只是作为“海外的不同声音”，在80年代，在批判传统已成民族思维定势的亢奋年头怎能听得进冷静的思考？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另一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是：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以反传统为特征姿态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有否也承传了中国文化传统？承传传统，是否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

即以《新青年》、《新潮》周围的一批五四文学新潮人物来说，批判传统的激进姿态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他们大都来自北京大学文科师生，他们从家乡授学到北大修课，攻读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文科课程并无新文化课），他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是和承受传统文学共时态发生的。中国现代作家们，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大多是中国传统教育，直至壮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熟谙与爱好，是和他们鼓吹新文学创作交互发生的。我们可以在这些中国作家的周围发现一批与其一生有血缘联系的中国古典文学家、思想家。例如，鲁迅之于魏晋风度，郁达夫之于黄仲则，徐志摩之于袁子才，何其芳、戴望舒、陈梦家之于温庭筠、李商隐，冰心之于婉约派诗歌，田汉之于中国戏曲，巴金、曹禺之于《红楼梦》，周作人之于公安派，周作人与丰子恺之于释、道思想，还有闻一多对庄子、唐诗等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与考证，朱自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朱光潜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阐发，郑振铎对俗文学的探讨，等等。即以最反叛者郭沫若言，少年郭沫若在其“诗的修养时代”就受到“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韩退之（不喜欢）、白居易”等的熏陶与影响。他对屈原，李白、苏轼的深湛研究，已经与他终其一生的个人爱好、崇信联系在一起。他研究屈原，翻译屈赋，著历史剧《屈原》，弘扬“屈原精神”，他是以“屈原”自命的。他著《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全面整理先秦文化，推崇孔儒与老庄思想，因为他认为“我国固有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这时代的思想为一些断片散见于诸子百家，我们怎么也不能否定。”在在说明他们所采取的反传统姿态，是要根除传统中的陈腐与弊端，他们并不否定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因素。正如郭沫若在 1923 年就提出的口号：“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吮吸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论中德文化书》，《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

更重要和深潜的，是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影响。我在《中国现代文学本土潜在传统》（《文艺争鸣》2003 年第 3 期）中写道：“中国现代文学许多崭新形式的外来形态掩盖了本土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的承传。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象血液，它流淌在民族的血脉中。它是民族的

灵魂，主宰着民族的生存、走向与特征。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具有历史延续性。……这些基本因素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凝聚了这一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民族心理的基质，最典型地体现了文化的本土特征。它们也历时态地积淀在民族文化精神中，使这一民族要想摆脱或改变这些基质因素也不可能。它们与民族、与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的关系，是如此地血肉交融在一起。”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从传统中走来，它成长于这个从传统发展而来的本土文化环境。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冲突与激荡中，它的内蕴透出本土传统的潜在力量。

例如，当五四先锋们大批特批孔孟思想、打倒孔家店时，他们自身的行为就在深刻地践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贯穿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主要思想力量，那般激荡澎湃的精神的主潮，是忧国忧民、民族救亡、民族振兴的精神，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的精神情怀。需要指出的是，奉献于文学中的这种崇高悲壮的精神，由现实激发的这种思想力量与文化精神，同本土传统文化精神有血缘关系，尤其是同儒家思想中“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同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人文主义，有着血脉承传的姻缘。

其他，关于美学思想，关于民族文化一审美心理的古今相通，更为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致力于“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考察这一段中国近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关系的结果是，我发现：“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种种新特征、艺术上的种种新因素时，不仅要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同样要关注到本土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潜力的释放。我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现代性因素的萌芽，不仅在晚清，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

我希望开拓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与视野，更新文学史观念，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沟通古今。王彩萍原是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苏州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招收古代文学研究经历的研究生，是我多年来的寻求。但是我国长期来学科分类的狭窄、研究生培养专业的过于精细，导致研究生专业知识的单一与视野狭隘。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几乎运作完全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操作方式。王彩萍一入学，我就给她明确了论文选题，我知道这会给转换专业的王彩萍带来很多压力。但是王彩萍默默地，坚韧地进行着，进入了她原先陌生的当代文学领域。期间种种困难，种种干扰，种种困惑，她从不说不，也从不叹苦经，她的内心坚定，不犹豫，她总是自己去克服化解。我也从不催促她，我明白她有毅力去战胜，达到她自己设定的目标。三易寒暑，寒窗面壁之功，她终于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和她的两位同门师兄弟南志刚、陈黎明一起坐到论文答辩席上。

王彩萍的博士学位论文选取儒家文化与新时期作家为论题，做出了较系统的研究。儒家文化传统同中国文化现代化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儒家文化同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关系，过去人们关注不多。王彩萍的论文对儒家文化精髓、新时期儒家文化的际遇的把握，和对它再认识、再评价的论述，都表明了作者在古代文学研究上所下的功夫和具备的文化素养。她从宏观的文化角度把握儒家文化同新时期一些作家的关系，并对这些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其中对新时期作家精神走向的分析，很有份量，很有创见，对士的精神的多层面的追寻也颇具意义。这些显示了王彩萍的治学潜力。

2005年王彩萍到宁波高校任教，她的博士论文选题经评审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建议她从古今文化精神层面进一步提炼深化论述对象。她设计为从六个方面探讨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精神的关系。这部专著的思考与论述当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从2002年入学苏州大学博士专业，至今十年，王彩萍手绘了圆满的人生答卷。这本不轻的书记录了她的艰辛和精神历程。这是最值得珍视的。

朱栋霖

苏州读万卷堂

2013年3月11日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新时期:儒家文化再认识再评价	(1)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	(2)
第二节 儒家人学观念及其现代应用	(9)
第三节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	(18)

上 编

第一章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士的精神	(29)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士的传统	(29)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士的精神的凸显	(38)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士的精神的个体化展现	(51)
第二章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道德意识	(64)
第一节 道德: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64)
第二节 义利之辨的基本标尺	(68)
第三节 两性道德的时代嬗变	(77)
第三章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中和审美意识	(97)
第一节 从中庸之道到中和之美	(97)
第二节 情感含蓄的递相传承	(111)
第三节 语言节制的三重境界	(123)

下 编

第四章 新时期作家追寻的“士”之魂	(139)
第一节 宗璞:精英文化的观照	(139)
第二节 陈忠实:民间文化的视角	(149)
第三节 唐浩明:历史文化的挖掘	(154)
第五章 新时期作家立足的“德”之谛	(165)
第一节 巴金:知识分子良知中的儒家道德人格	(165)
第二节 从维熙:历史的道德化解释	(174)
第三节 王润滋:历史转型期的义利之辨	(181)
第六章 新时期作家表现的“和”之美	(191)
第一节 杨绛:情感含蓄与大家气象	(191)
第二节 阿城:语言节制与汉语写作之美	(200)
第三节 汪曾祺、张承志:古典意境及其现代转化	(209)
第四节 王蒙:中庸之道的现代回应	(221)
结语	(230)
参考文献	(240)
后记	(245)

绪论 新时期:儒家文化再认识再评价

20 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追求中,通过“继承、借鉴、创造”的复杂过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传统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得以诞生、发展的两条线索。在过去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化、文学的关系研究进行得比较多,^①而对其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具体到新时期文学^②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研究就更为薄弱^③,这不能不说是新时期文学乃至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缺失与遗憾。本书就是在文学

① 这方面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有:范伯群、朱栋霖先生主编的《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被评价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而又独创性地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学史著作”,被称为新时期具有“学科突破”意义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它的姊妹篇,朱栋霖先生主编的《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又进一步地探究了 1949—2000 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严家炎先生主编的国家重点图书《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2000 年版)包括十部著作,其中五部探讨西方文学思潮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举凡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西方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以及易卜生、卢梭、萨特、卡夫卡、福克纳、昆德拉等西方哲学家和作家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都得到了关注。

②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学界有新时期、后新时期的提法,但是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还是一个运用比较广泛的概念。本书指称的新时期文学即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文学,论题关涉的时间段主要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③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1992 年方锡德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一书,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关系的专著”。后来出版的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关系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罗成琰《回溯长河之源——现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1995 年版),谭桂林《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1999 年版),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2000 年版),哈迎飞《“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2002 年版),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2002 年版),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2007 年版)等。这些著作大都集中于中国现代文学时段,而对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涉猎不多,除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外,其他著作即使涉猎也只是部分地涉及新时期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关系研究。

史研究的这一宏观背景下，试图集中探讨儒家文化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并且选取了作家这一角度来进行。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

“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精神”是文化与文学的双向研究、对接研究，一头联系着新时期作家，一头联系着儒家文化。也许在本书的开始，首先需要阐明我们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以及对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价值、意义等方面的理解。这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儒家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诸多不适应以及人们对儒家文化持续长久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来源于研究者的情感要求。在对儒家文化的探究过程中，研究者经常面对的是现代以来对儒家文化或赞同或批判的两种声音，因此从情感上也要求对如何对待儒家文化做思想上的清理。这需要追溯历史，考察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遇到的困境，更需要站在当下，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整体观来考察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存在的实然情形与应然情形，以此对儒家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意义、价值作出判断。

—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在政治层面上，儒家文化利用它的德治思想与民本思想规约着统治阶级的行为，使之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至于暴虐苛政走向动乱。在社会层面，儒家文化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根基，以孝悌尊亲，尊卑等级，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为倡导，利用广泛的家训乡约传布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建立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网络，从而保持了整个中国社会长期稳定而缓慢的发展。但是儒家文化在跨入现代社会门槛的时候，却遭遇困境，受到严峻的挑战。

1840年以后，中国结束了独立、自洽的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被动进入纷纭复杂强手如林的世界格局之中。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世界，这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是一个重视个体张扬个性的时代，一个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而这些都是传统儒家文化所不具备，并且也是无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返本开新开出来的。首先工业化时代的重要助推力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工业化时代的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获得丰厚物质基础的能力。以儒

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注目的中心不是向外的科学研究与征服自然,而是着眼于人文世界的建立、伦理道德的规范、内在的人格修养。并且因为中国文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对自然宇宙的把握是以一种直觉的、整体性的方式进行,无法产生近代科学;其次,现代文化是注重个体张扬个性的文化,而儒家文化是讲究等级制讲究群体性的文化,在儒家文化中,个体只是人伦关系中的一个个点,个体的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个性无法张扬,压抑了生命的创造活力,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了的人学观念;第三,现代社会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号召,但是儒家文化因为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在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更加强了等级制、集权专制的理论,即使儒家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也只是站在维持统治秩序的立场上,无法开出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尤其是宋明以后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端,进一步窒息了中国文化的活泼生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儒家文化无力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无力改变民族精神的衰颓与委顿,无力重塑民族精神的危机。

儒家文化在跨入现代社会门槛以后受到的严峻挑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时代性的落差。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西方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而中国还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社会,儒家文化诞生于中国的农业文明中,与中国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小农经济为生产组织方式的文明方式配合默契息息相关。从人学观念来说,现代西方是一个张扬个性,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社会,而中国社会还处在群体本位阶段。不容否认,西方文化中张扬个性重视个体的人学观念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是儒家文化以群体为本位而不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人学观念从人类发展趋向来说肯定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一个逐步从群体走向个体的历史。原始神话时期,人类匍匐在天地之中,在蒙昧状态乞求着神灵的庇佑。随着时间的前移,人类的类意识逐渐觉醒,但是在蛮荒的自然面前,人类还需要以群体的力量去战胜自然,获取自己的一份生存。随着人类发展得越来越强大,人应该能够以个体的人的身份来担当自己的命运与生存(当然,以个体的人为基础,不否认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还需要在个体的人基础上实现动态的平衡),这也是现代社会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人学观念的内在理由,个体的人不仅使人获得“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尊荣,而且也是现代社

会倡导的民主、自由的基石。因此，儒家文化群体本位的人学观念与现代社会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人学观念的时代性落差使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遭遇极大挑战和深刻危机。

儒家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门槛时表现出的衰颓，其与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都使得现代中国人产生必欲离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方能救国于水火的想法。因此向西方学习成为现代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门槛之后进行自我拯救的一个主要举措，也因此思想文化界的反儒家文化思潮一百多年来一直不绝如缕，在一些关键的社会转型期更表现出激进主义的态势。从五四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开启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框架，传统与现代是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传统与现代势同水火，无法兼容，现代一词中暗含了“西化”的含义。五四时期，陈独秀号召青年“吾人最后之觉悟”^①，鲁迅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②他甚至提倡不读中国书。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现代化再次进发的时候，人们审视历史，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儒家文化。80年代的一部分激进主义者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与现代价值理念格格不入，与现代化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因此不能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否定。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无论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还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它都没有必要现代化，也没有可能现代化”，因为儒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结构系统以及与此相应的价值系统，与现代化的需要格格不入，甚或完全对立”。因此正像历史所显示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总是逆向的精神力量”，认为传统文化已经终结。^③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次次被批判，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扬弃。中国现代文化正是在对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因素的不断扬弃中，在对西方文化的不断接受改造中建立起自己的整体架构的。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② 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③ 参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谢选骏《传统文化已经终结》（《电视月刊》1988年第10期）等文章。

二

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概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比较明了地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所来路径与发展趋势。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观,在现代文化的整体观下,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摆脱中西体用之争,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当我们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途径是:中国现代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利用西方文化资源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更新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化中,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两个支援性资源。正如化学中和反应一样,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不是1+1的关系,而是得到了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质。就儒家文化来说,完整的儒家文化体系在现代社会已经解体,儒家文化已经丧失了其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的主导地位、统治地位。中国现代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吸取了其优秀的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成分,而扬弃了它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因素。

对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文化,赵吉惠先生有一个“基质和母体”的说法^①,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一个比较恰当的说法。现代汉语解释“基质”的含义是“植物、微生物从中吸取养分借以生存的物质”。“基质和母体”这一说法既承认了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保持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又表示了它们是中国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方面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新文化的资源,这种说法没有突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血肉联系,虽然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是构造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但是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应该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一种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新文化的基础,“基础”这一词突出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忽视了因为西方文化的介入、融合,使中国现代文化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性特征。而“基质与母体”这一说法既突出了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生发

^① 赵吉惠:《关于中国文化重要理论问题的见解》,《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出来的，同时也表明了其对西方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现代文化整体观下，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现代文化的扬弃，其优秀因素发挥着延续中华文化之根，保持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安妥民族生命灵魂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这一点已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被证实，又被当下的社会现实所召唤。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追求中，儒家文化的优秀因素以民族精神的形式一直在潜隐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来说，他们激烈地反对儒家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救国救民，挽救中华民族于颓势，支撑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依然是儒家赋予他们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五四’反传统的深层语法规则，正是中国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忧国兴邦为要务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语法规则导致了反传统，这在逻辑上是一个悖论，但在‘五四’却是一个真实的悖论——‘五四’人物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越激烈，所表现的以家国振兴为要旨的使命感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也就越强烈”^①。在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中，正是不甘外侮、自强不息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国人克服困厄，一步步地走向现代化的征途。我们曾经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我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艰难岁月。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中国人一步一个脚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地走出来的。列文森、马克斯·韦伯等都曾经断言儒教文明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文化的内涵是广阔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所有的理论面对浩瀚的民族文化也只能做到片面的深刻，它就文化的某些方面是有见地的，而无法就一种文化整体作出判断。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国走向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性支撑力量。

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目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的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与急剧变化的时代带来的新因素有关，但是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与近百年来我们有意识放弃传统文化从而也放弃了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关。我们只要稍加寻踪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因素就可以看到问题症结所在。

^① 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4页。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化在建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吸收,在思想文化界也时有全盘西化的论调,但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发展是依据中国现实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它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从中国文化的欠缺入手,是以中国自身的主体性来吸收的。我们引进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套什么是“正当”的伦理规范,为我们提供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但是“自由主义告诉我们的,只是人们如何共同相处,如何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但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这些存在层面上的问题,自由主义并没有特定的答案,只是为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提供制度性保证。自由主义相信,最好的人生是自由选择的人生,但究竟什么是‘好’,自由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结论”^①。

文化是一个整体,尤其是代表了一种文明方式的文化更是如此。每一种文明方式下的文化各以其不同的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的理解完成了对世界与人的建构,各自提供了这种文化中的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与价值,提供了人的心灵安稳方式。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提供了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与价值依据,它使得西方人在对上帝的皈依中完成了自我灵魂的安顿,并起到了建构社会道德体系的作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连同道家文化一起模塑了中国人注目于人间社会的“一个世界”观,与西方文化中对上帝的皈依不同,中国人在对人间伦理亲情的体认中,在对大自然的审美情感中,在对自身反身而诚道德内省从而达到与天地相沟通的境界中安稳了自己的灵魂,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对西方人来说,个人的独立自主、宗教的寄托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对中国人来说,自身的人格修养、到大自然中去、在人间亲情中寄托了他们存在的终极意义。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安身立命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化还必须到传统中去汲取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也因此我们现在面临信仰缺失、道德危机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足以为中国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在社会中的式微。一百多年来对儒家文化的持续批判,使我们可能犯了“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的毛病,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家文化因素被我们倒

^① 许纪霖:《核心价值,自由主义的还是儒家的?》,《天涯》2011年第6期。

掉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家文化因素也被我们倒掉了。我们因此陷入了邯郸学步式的困境。来自传统的价值体系、终极信仰崩毁，而西式文化还不能够提供给中国人存在层面上的价值依据，因此诚信危机、道德危机等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症结，我们陷入了价值的真空地带。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背后显示的是商业伦理的缺失，在我们这个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的国家，老人跌倒了该不该、扶敢不敢扶竟然也成为新闻媒体和网友激烈争辩的问题。在日常的议论中，人们感叹中国人缺少信仰。缺少信仰，只好就近抓住什么算什么，在经济社会中就是钱了，于是人们感叹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发挥着延续中华文化之根、保持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安妥民族生命灵魂的重要价值与意义。现代以来，很多学者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过总结，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把“和谐”指认为中国民族精神^①，张岱年在《文化与哲学》中把《周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提炼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②。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无疑都希望从传统中汲取优秀因子，并使之进入现代社会，发挥传统文化应有的作用。中国士阶层讲究风骨气节，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依然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权力与金钱挤压下保持精神平衡的重要价值凭依。传统中国人因做好人而获得的心安理得境界依然是我们今天社会道德重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在中国现代文化整体观之下，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化既具有与世界文化相沟通的内涵，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国文化历来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我们应该以一种更自信更恢弘的胸怀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为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①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探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54页）。

^②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封面开篇一段话即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